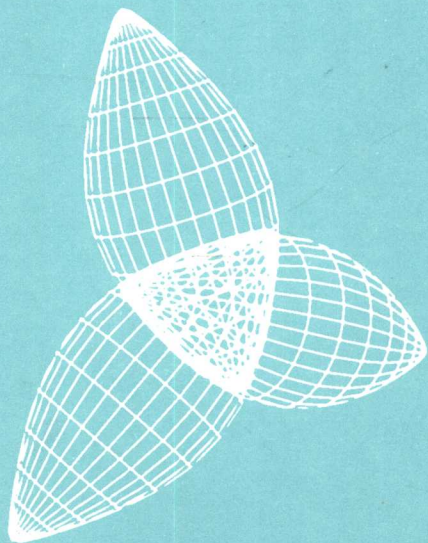


王振铎
著

编辑学理 与媒体创新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BIANJIXUELI YU MEITICHUANGXIN

编辑学理论与媒体创新

王振铎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编辑学理与媒体创新/王振铎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649-0073-1

I. ①编… II. ①王… III. ①编辑学—研究 ②传播媒介—研究
IV. ①G232 ②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1966 号

责任编辑 龙玉明

责任校对 焦向荣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33

字 数 507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插 页 1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王振铎先生

从小学生到大学教授，在接受教育和传授教育过程中，总不断与报刊编辑结缘。写稿、投稿、改稿；收稿、审稿、编稿，将稿件变成媒体出版。颇有些“编”与“审”的“感”和“悟”。始料未及，终于走上研究编辑出版学的道路，追寻着至今仍未满分的答卷：编辑角色究竟是干什么的？该怎么干……



与日本友人合影

左一，植田康福，日本出版学会会长，东京上智大学教授。左二，吉田公彦，日本出版学会前任会长、日本出版教育家、《出版教育研究所报》主编。左三，本书作者王振铎教授。左四，清水英夫，日本出版学会前届会长，日本出版学家。著有《现代出版学概论》等，有中译本出版。左五，邵益文，中国编辑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原副所长，编辑出版学家，论著颇多。



韩国南奭纯教授来河南大学讲学

韩国出版学会副会长，金浦大学教授南奭纯应邀来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学并座谈编辑出版学专题。左一，王振铎教授。左二，南奭纯教授。左三，李建伟院长、教授。左四，张天定系主任、教授。

序 一

振铎同志的著作《编辑学理与媒体创新》即将出版,我很高兴。这是他对编辑学研究的新奉献。振铎同志鼓励我为之写几句话。

我和振铎同志在中国编辑学会同事多年。对他研究编辑学的刻苦治学精神,我一直深为敬佩。他的著述甚丰,全面涉及我做不到。我选振铎同志提出的编辑学三原理,说一点读后感吧。

编辑学三原理就是文化缔构编辑原理、符号建模编辑原理和讯息传播编辑原理。为什么选了它呢?因为我觉得振铎同志对它很重视。多年来,他对编辑学三原理的研究锲而不舍。这在他的编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他编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振铎同志“从人类文化学、符号学和语言学的角度,……从现代心理学、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角度”(《编辑学原理》修订版第133页),来考察和研究编辑活动,其探索精神引人关注。

文化缔构编辑原理给我的最深印象是突出文化。振铎同志强调:“中国的编辑学界明确地认识到:编辑必须把建构高尚的文化作为整个出版产业链上的中心,编辑必须高举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本书第127页)“编辑作为缔造媒介文化结构的活动,以研究这种活动为己任的编辑学,把自己定位在社会精神文化的创造、积累、传播和交流这个动态结构系统中,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本书第171页)开宗名义,观点鲜明,我举双手赞成。文化,只有文化,既是编辑活动的出发点,又是编辑活动的落脚点。文化,是编辑活动的灵魂,是编辑活动的生命。振铎同志提出:“编辑是人在精神生产过程中,选题立意,摘文取材,鉴审加工,有序组合,为传播特定讯息而缔构各种文化媒体的活动。……关于编辑活动的这种观点,我们曾概括为‘文化缔构编辑观’,从编辑活

动造成的媒体机制上说,也可以称为‘文化缔构编辑原理’。这个理论观点初步揭示了人类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过程中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本书第 242 页)在这里,对编辑活动的过程的描述是切实的,对编辑活动的内容的判断是准确的。核心是两个字:文化。这是一个很高的起点。

文化缔构编辑原理的涵义是什么?振铎同志解释:“编辑活动在整个社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处于中介地位,起着枢纽作用。具体讲,对文化产品的生产,起着引导、设计和组织等开发性的作用;对生产成品,起着鉴审、选择、淘汰和修正等把关作用;而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大厦又起着构成、审验和革新等作用。从这个角度、用这个思路来观察和研究编辑学,就得出编辑活动是社会精神文化的缔构活动。”(《编辑学原理论》修订版第 19 页)这个解释总体上不错。编辑活动的能动作用是公认的。而且编辑活动的能动作用,无不落实在文化的创新和传播上。这应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为什么把它概括为“缔构”?振铎同志也有解释:“之所以叫‘文化缔构’而不叫‘文化创造’、‘文化生产’、‘文化建设’、‘文化传播’、‘文化积累’、‘文化选择’等等,……就是因为‘缔构’不管从本义还是从引申义来看,都最能表述编辑活动的‘组织’特性或‘结构’特性,既含有创造性、生产性、积累性的某些意思,又含有组织传播、结合构成、选择审定等意思。”(《编辑学原理论》修订版第 241 页)“缔构”一词,“突出‘缔结’和‘构造’的意思,说明:编辑的创造性,主要不在于独自的原始创造,或元件性的创造,而在于综合组织、装配构成整体结构的创造。”(本书自序)应该说,这个解释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概念的形成,首先要求准确反映客观实际,其次也还要求社会广泛接受。人们对“缔构”一词难免有个逐渐熟悉的过程。不排除别人还会另有说法。重要的是,振铎同志着力研究的文化缔构编辑原理,把编辑活动在人类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提到了相当的高度。

接下来是另外两个原理:符号建模编辑原理与讯息传播编辑原理。振铎同志这样描述:“基于文化缔构编辑原理,或者向多种文化媒介的不同编制模式进行横断研究,或者向历史与未来文化结构中的讯息传播效应进行纵深研究,又会逻辑地引申出符号建模编辑原理与讯息传播编辑原理,从而初步形成编辑学的理论框架。”(本书第 242 页)这告

诉我们,后两个原理是从前一个原理引申出来的。能不能因此认为,在三个原理之中,文化缔构编辑原理是主导的呢?振铎同志明确说过:“我们把文化缔构原理看作编辑学的第一原理,或曰最基本的原理。”(《编辑学原理论》修订版第19页)还说过:“就这三个基本原理而言,文化缔构原理涵盖编辑活动的性质、目的和方法,总体制约编辑活动的实践,应为最基本的原理。符号建模原理和讯息传播原理是编辑活动运作规律的具体概括,是实现缔构社会精神文化目的的方法原则。”(《编辑学原理论》修订版第26页)一个由此“引申”,一个“第一原理”,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已经足以认定文化缔构编辑原理在三个原理之中的主导地位。我希望这样理解没有违背振铎同志的本意。而认定这一点,对于坚持编辑活动的文化导向非常重要。

符号建模编辑原理借用了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编辑活动。振铎同志说:“编辑活动,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主要是应用种种符号来建造各种文体模式与媒体模式,即创造媒介载体的活动。”(《编辑学原理论》修订版第21页)“编辑活动,从符号学的眼光来看,就是正确掌握各种文化符号,充分发挥符号自身的特性和功能,借以建立丰富多彩的文体模式和媒体模式,尽量满足……文化交流需要……”(本书第149页)“他们所从事的编辑出版活动,从符号学的角度说,就是确认或核定符号代码公约,保证讯息编制的规范化和讯息传播的有效性。”(本书第155页)编辑学研究需要对编辑活动进行理论概括。符号建模编辑原理对编辑活动所进行的概括,是大致符合实际的。它为我们对编辑活动的理性思考提供了支持,其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是如果苛求,也不是没有一点疑问。比如,符号学的色彩比较明显,编辑学的色彩相对薄弱。编辑学研究借助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看来有一个吸收、消化和创新的过程。能不能做到,精神是符号学的,“符号代码”是编辑学的?这也许是下一个研究目标。

讯息传播编辑原理借用了信息论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编辑活动。振铎同志说:“编辑活动遵循着讯息传播原理运行,便形成这样一条规律,即采集有关讯息,选其所需要者,加以智能化整理并且编为特定的符号模式,构成完整的传播媒体,借以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编辑学原理论》修订版第25页)“编辑活动最根本、最主要的任务,正在于遴选和缔造各种讯息结构,使之成为规范化的、完整的文化传播媒

体,实现讯息传播的目的。”(本书第 133 页)他直接提到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编辑活动,用这‘三论’的方法来看,也正是把讯息的采集——讯息的存储——讯息的处理——讯息的发送——讯息的接受和反馈,作为一个类似‘通讯’的系统过程,实现对讯息传播的最佳控制。所不同的是,编辑活动在传播的内容方法和目的方面有自己更为明确而具体的文化要求。”(《编辑学原理论》修订版第 144 页)用信息论来分析文化的创新和传播确有优势,前后脉络比较清楚。但是如果苛求,也不是没有一点疑问。这里也存在着信息论的色彩比较明显、编辑学的色彩相对薄弱的问题。此外,还涉及另一个问题:编辑活动是为传播活动做准备,还是直接承担传播活动?如果编辑活动直接承担传播活动,信息传播的理论适用于编辑活动。如果编辑活动只是为传播活动做准备,不直接承担传播活动,信息传播的理论可能不完全适用于编辑活动。因此,这个讯息传播编辑原理的论述似乎还可以再加斟酌。

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编辑学研究以最终构建普通编辑学的学科体系为目标。多年来,振铎同志着力研究了编辑学三原理,同时还进行了编辑学其他课题的研究。“从整体的编辑实践活动中,引出了文化缔构、媒体建模、讯息传播等基本原理,同时延伸至编辑管理、编辑教育诸方面,形成了一个框架雏形。”(本书第 244 页)振铎同志以三个原理为主干的编辑学研究成果,具有新颖性、理论性和系统性,为建立普通编辑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建立普通编辑学,一直也是振铎同志的愿望。人们自然想到,振铎同志会不会对现有研究成果加以提升,进一步构建普通编辑学的学科体系?人们的这个企盼是合乎逻辑的。

建立和完善普通编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因为编辑学的学科建设时间不长,还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编辑活动变化很大。在这个过程中,多方探索,彼此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前几年有文章说,编辑学研究一直七嘴八舌,争论不休,言下之意是编辑学研究不怎么样。恕我不能苟同。我承认,编辑学研究还要继续努力,继续前进。但是,七嘴八舌,争论不休,却不是坏事。第一,它表明编辑学研究很有活力,不是暮气沉沉。第二,它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常态,不是停滞不前。世上有哪一门学科不是经常争论?可以说,学科发展的过程,就是学术争论的过程。学术研究,需要百家争鸣,拒绝定于一尊。振铎同志说,编辑学三原理问世之后,“对其肯定、补充、深化和拓展者有之,对其质疑、责

难、论争和批判者亦有之。”(《编辑学原理论》修订版自序第3页)这无疑是对振铎同志的编辑学研究的有力推动。希望振铎同志的普通编辑学瓜熟蒂落,自成一家。希望其他同志的普通编辑学异彩纷呈,各有千秋。让编辑学界内外眼前为之一亮。那将是何等令人振奋的盛事!

刘 果

2009年12月22日于北京

序 二

收到王振铎先生寄来的《编辑学理论与媒体创新》的校样，要我作序。振铎同志是我的老朋友，老朋友要出新书，我当然首先是高兴，向他祝贺。一翻校样，原来是他二十余年来辛勤研究编辑学的部分成果的展示。洋洋四十余万言，是近年来编辑学读物中一部颇具影响的著作。要我写几句话，我当然不便推辞。但是一大摞校样摆在面前，尽管他的基本观点我是了解的，其中有些文章也曾经拜读过的，但对一位作者来说，集文成书，可能作些修改是在所难免的。所以不看一遍，于心难安，而要看一遍，有的甚至不止一遍，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看着看着，觉得有收获，不知不觉地读了起来。最后掩“卷”回味，综观全稿，再一次印证我对他的印象“勤奋治学，勇于独创”。他的许多观点、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创一家之言。不愧为编辑学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花坛中一枝独特的奇葩。

可是正当我想动笔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機會，我有幸拜读了刘果先生给这本书写的序言，看了以后，获益匪浅，但同时面对刘先生的高度评价和精辟分析，大有“眼前有景写不出，崔颢题诗在前头”之感。思之再三，我只好信马由缰，说到这里哪里了。就算是我的一点学习心得，也是给老朋友的一个交待。

振铎先生的专业是中文，毕业于我国素负盛名的河南大学。听说他早在大学时期，就在一个文学评论刊物发表过论文，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曾经轰动全校。这说明他刻苦学习，有自己的见解，堪称优秀学生。

毕业后，留校教学，编学报，后一直执教于母校。1980年代，编辑学在中国兴起之时，他即投身于编辑学的研究与教育。河南大学并不是中央指定的首批3家试办编辑学专业的高校之一，但还是比一般高

校起步得早,这大概和他当过多年学报编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振铎先生在编辑学的教研工作中,不倦地追求,一以贯之,而且至今仍退而不休,成果丰硕;同时又桃李满天下,学生遍及全国各地,这是他四十余年不懈努力的结果。

由于振铎先生等一批学人的努力,河南大学是我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举办编辑学研讨会的学校。大概是在1986年底全国首届出版科学学术研讨会之后不久,可能是1987年上半年,振铎先生就和我商量,想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编辑学研讨会,我当然赞成。但由于当时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正在准备全国第一次图书编辑学研讨会,拟在乌鲁木齐举行,相当紧张,河大开会之议,只好往后放一放。9月,乌鲁木齐会议开幕,这次参会人员不多,一共只有21个人,主要是业界的同仁,但振铎先生参加了,可能是唯一受邀的高校教研人员。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们和边春光同志一起商量,决定河大的研讨会由两家合办,具体由河大筹备,在第四季度召开,老边和我都去参加。河南大学和振铎先生对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很快就商定于11月6日在郑州召开。事有凑巧,正当河大会议前夕,新闻出版署党委通知:要组织慰问团到商丘看望署机关和直属单位,在商丘支教的讲师团同志,正好研究所也有同志在讲师团。我就和魏玉山同志提前两天先到商丘,然后再到郑州开会。不料我在商丘被开水烫伤,动弹不得,一躺就是十多天,不能前去赴会。会后,振铎先生专程从开封到商丘看我,谈了会议的情况,边春光同志和省、校有关领导都讲了话。讨论也很热烈。我未能参会深感遗憾。12月16日,经医生同意,我被担架抬上火车,到郑州转车返京,不想振铎先生又在开封上了同一次火车,到郑州为我送行,我很感动。

从1987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早期活动开始,到现在的中国编辑学会,振铎先生一直积极参与编辑学学术活动,而且根据自己的编辑经验和教育实践,发表了许多有见解的文章,并且合著出版了《编辑学通论》、《编辑学原理论》,最近又出版了《编辑学原理论》(修订本)。直到这一本《编辑学与媒体创新》,应该说都是很有见地的。

振铎先生在学术活动中敢于独创的精神,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他的编辑学三原理,就是新的独创,尽管其中有借鉴的成分,但对编辑学来说,确实是独特的。这方面许多同仁都有过评述,我就不赘言了。

记得 1985 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中国书的起源和发展》^①,说明“图书是一种工具……人类从蒙昧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图书的功绩是伟大的,不能忽视的”,“可是图书并非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它从内容到形式,经过长期的发展,有了重大的变化”。上世纪 80 年代,在讨论编辑活动起源时,也说过“编辑活动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又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最早的萌发,到纸介印品……再到多媒体编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②,认为甲骨不仅有文字记录,还有小洞可以串联,甲骨文的册数和册的次序,可以说是“我国最原始的书的雏形”,也说明了编辑活动的萌芽,“尽管这种活动是很原始的”。^③ 这是我当时的看法。这次拜读了振铎先生的有关文章,虽然我们的观点是相似的,但振铎先生以翔实的资料,周到的分析,不仅论证了甲骨有编辑活动,而且有复制的迹象,使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助于今后继续学习这个问题,应该好好地感谢他。

振铎先生在本书《编辑活动的特点与规律》一章中说,编辑活动有三条基本规律,“即缔造文化结构的规律,创建符号媒介的规律和传播知识讯息的规律”。并说“三条规律在整个编辑活动中缺一不可,是自始至终存在并运用着的规律。”又说“基本规律究竟有几条,那就看实际的矛盾有多少,看矛盾运动的具体条件和环境的复杂性而定。”(本书第 224 页)这里给人的印象是规律不分主次,三条都是基本规律。但在拜读《编辑学原理》(修订本 2009 年 6 月版)后,发现提法有了一些变化。书上说“编辑活动的性质、特征以及活动规律,都是在社会文化结构中体现出来的。文化缔构原理是编辑主体在社会文化实践活动中遵循的最基本的原理。”“就这三个基本原理而言,文化缔构原理涵盖编辑活动的性质、任务、目的和方法,总体制约编辑活动的实践,应为最基本的原理,符号建模原理和讯息传播原理,是编辑活动运作规律的具体概括,是实现缔构社会精神文化目的的方法原则。”还说:“我们把文化缔

① 参见《出版与发行》1986 年第一期。

② 参见拙著《20 世纪中国的编辑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0 页。

③ 同上第 39 页。

构原理看做编辑学的第一原理,或曰最基本原理。”这个新的表述,当然是一种进步。在学术研究、理论探讨上思想有发展,认识有深化,完全是正常现象,在实践中创新,在研究中独创,更是如此,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根本原因。

愿振铎先生在敢于独创、不断创新的道路取得更多的成果,为编辑学的学科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邵益文

2009年12月28日

序 三

振铎同志将他历经多年撰写的即将付梓的大作《编辑学理与媒体创新》的清样拿来，嘱我为该书写序。霎时间我踌躇起来了。一来自感才识浅薄，力不胜任，二来我对他研究的领域缺乏深入研究。便推说还是不写吧！他说：咱是老同学，你对我了解，还是写几句吧！看来难以推辞了。

是的，我和振铎同志 1955 年一起考入河南大学（当时叫河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同班 4 年。1959 年毕业之后，一同留校任教；上世纪 80 年代又一起编《河南大学学报》；退休之后，又在新闻与传播学院担任编辑学研究生导师。50 多年来，朝夕相处，交往频繁。基于上述原因，写序之事，盛情难却，只好听命了。

我用了十多天时间，将《编辑学理与媒体创新》粗略看了一遍，内心充满惊喜。这部约 50 万字的论著，是振铎同志积几十年研究心血的结晶，是他辛勤不辍耕耘结出的一颗硕果。阅读之余，给我留下诸多难忘的深刻印象。

一是主线突出。学界有一种说法，一抬足不能无方向，一著述不可无宗旨。说的是为文著述都要有一个明确的主旨和中心。本书的内容有五部分构建而成：《出版文化史观》、《编辑学理》、《媒体创新》、《编辑出版与教育》、《编辑审读与评论》。这五部分内容独立成体，论述各有偏重，但始终围绕一个聚焦点：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编辑学理论及其完备的学科体系。全书内容自始至终贯穿这一主线，条理分明，主题突出。读来既了解了中国近几十年编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又能感受到作者在为构建中国编辑学理论体系中折射出的诸多真知灼见。

二是勇于创新。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求知的过程，它贵在创新。抄袭、模仿，走别人走过的老路，永远不会在学术上有什么作为。大凡在学术研究上造诣深，有所建树之人，都具有一种不同凡俗而善于

发现出新的独创精神。我国已故著名科学家严济慈生前告诫青年：“我们说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创新的，研究的结果应该是从未有过，而又能被别人重复的，得到的看法应该是从来没有提出过，而又能逐渐被别人接受的，完全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由于人们受主观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学术探讨中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不可能达到穷尽真理，而只能接近真理。在这过程中，要有一种打破常规，勇于探索，敢于冒险，另辟蹊径，发前人所未发之论的精神。本书中多处论到作者在 80 年代概括出来的关于编辑学的基本规律，即文化缔构规律、符号建模规律、讯息传播规律，曾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作者提出的能够涵盖多种编辑活动的、超越书刊出版媒体而带有更大普遍性的编辑概念及其性质、任务、目的、方法，能从整体上指导编辑实践活动的总则——文化缔构编辑观，这一见解提出后，在全国编辑学界曾引发了持续几年的关于“编辑概念”的大讨论，对深入开展编辑学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是针对性强。学术研究总是针对现实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某些问题有为而发，提出一些疑点，解决某些难点，创立新说，不断推动学术发展。由于受习惯势力的影响或其他因素的制约，一定时期学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会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势和固有的僵局，这时往往需要出来一些敢于创新的人物，打破原有的定势和局面，才能促进某些问题在新的起点上有所冲破和前进。2000 年前后，在我国期刊界出现了一场有关“核心期刊”的大讨论，不少论者不加分析，对“核心期刊”一片赞扬之声，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书作者以极大的学术勇气，在其撰写的《质疑“核心期刊”论》一文中，对究竟什么是“核心期刊”？它对我国期刊的管理是否能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对期刊的发展和繁荣能否起到正确的推动作用？对我国出版文化及其市场管理来说，“核心期刊”论是科学真经呢，还是谬误流传、盲目误导等，提出大胆质疑。该文在《出版广角》发表后，特别是经《新华文摘》与《南方周末》全文转载后，由于抓住了期刊界普遍关心的问题，针对性强，见解独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数十家报刊对这一问题的大讨论。尽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看法不尽一致，但促使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其作用可谓大矣！另如对当前出版界存在的同质化现象的剖析也自有很强的针对性。